关于十九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若干思考

徐松巍

Taking the Opium War Year of 1840 as a dividing line, historical research on China's nineteenth century borderland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e research of the earlier stage was characterized by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serious and precise academic studies, and writing, which reflected an active interest in public affairs as well as a bright and rich spirit of patriotism. Later research on the one hand inherited the earlier period's superior academic standard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adjusted to the great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ies. A new trend of join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orderlands with the history of foreign countries appeared which had a great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cholars and society of that time.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源远流长，经久不衰，而关于边疆史地的研究，可追溯至清初，但边疆史地研究真正成为专门之学，且风靡海内，并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深刻变化，乃始自十九世纪。这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察研究：

一、十九世纪前期边疆史地研究的时代时征

所谓十九世纪前期，是指从1800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这四十年间的历史。由于这期间历史条件的不同和撰述主旨及研究重心的差异，十九世纪前期的边疆史地研究又分为两个阶段：1800—1820年为第一阶段，1820—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研究成果有：祁韵士的《蒙古王公表传》、《藩部要略》、《伊犁总统事略》、《西域释地》、《西陲要略》、《万里行程记》，徐松的《新疆识略》、《新疆赋》、《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斠注地理志集释》、《元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洪亮吉的《天山夜话》、《纪程》，萧腾麟的《西藏见闻录》，松筠的《西招图略》、《西藏巡边记》，和宁的《西藏赋》、《续水经》、《藩疆揽要》、《回疆通志》等等。此时，虽然清皇朝已开始了从盛到衰、由治到乱的历史性转折，但是从总体上说仍是承乾隆盛世余波。尽管“内忧外患”已初露端倪，然而并没有凸显出来。因此，这种潜移默化式的转折也没有反映在此阶段的边疆史地的研究中，相反，由于边疆史地研究的长期积累和“承平日久”，使这个阶段的边疆史地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首先，从此前的见闻杂录或游记观感走向系统研究。

开风气之先者为祁韵士和徐松。祁韵士在翰林院任国史馆纂修官时，奉旨编纂《蒙古王公表传》，史载：“韵士通核立传体例，计内札萨克四十九旗，外札萨克若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赛音诺颜，若青海，若阿拉善，若土尔扈特，多至二百余旗，以至西藏及回部，均应立总传、分传。羌无故实，文献莫征，虽有关于外藩事迹者，概为检出，以次复阅详校，每于灰坌种中，忽有所得，如获异闻。积累既久，端绪可寻。于是各部条分缕晰，人立一传，必见诸实录、红本为准。又以西北一带山川疆域，必先明其地界方向，乃以《皇舆全图》为提纲；其王公等源流支派，则复以理藩院所存世谱，订正无讹，如是者八年，而书始成。”①可见，边疆史地学的开创是

何等的艰辛！《蒙古王公表传》这种系统及其撰述成果的问世，则标志着边疆史地之学已成专门之学。对此，梁启超评价说："鹤皋（祁韵士）于乾隆季年在史馆创纂《蒙古王公表传》，凡阅八年，成书百二十卷，为中国学者对于蒙古事情为系统的研究，自此始也。"②这是对祁韵士开创边疆史地学的称许。同时，祁韵士还撰有《藩部要略》十八卷，当时著名学者李兆洛序是书时说："如读邃皇之书，睹鸿蒙开辟之规模。焉可不令承学之士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了然于天人之故哉！"③在李兆洛看来，祁韵士的《藩部要略》在边疆史地研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对边疆史地研究实有开辟导引之功。徐松在祁韵士等人所编的《伊犁总统事略》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新疆识略》亦是如此。史载："有图有叙，论山河之襟带，城郭之控制，兵食财赋之储积，田野畜牧之繁滋，条分件系，颠末详胪，成宪旧章，洵称赅备。"④这说明该书不仅内容系统完备，体例严整有序，而且材料丰赡翔实，考订精审确凿。正因为如此才同其前内容简略、篇幅寥寥、材料零散、甚至时有舛误的见闻杂录式的边疆史地研究划清了界限，使边疆史地研究成为专门之学，并为其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谓其后的研究者大都受过祁、徐二人的影响和启发，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则直接吸收和继承了祁、徐二人的研究成果，如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即是如此。

其次是此阶段的边疆史地研究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意识。

祁韵士于《西陲要略》自序中郑重地写道："近年士大夫役西陲，率携琐谈，闻见录等书为枕中秘。惜所载不免附会失实，有好奇志怪之癖，山川沿革，按之历代史乘，皆无考据。又于开辟新疆之始末，仅就传闻耳食为之演叙，讹舛尤多。夫记载地理之书，体裁近史，贵乎简要，倘不足以信今而证古，是无益之书，可以不作。"⑤这里祁韵士既批评了以往边疆史地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缺失和弊端，指出了真正的边疆史地研究应遵循的准则、采用的体裁，又提出了其撰述主旨以经世致用为指归，即有补于社会。这种明显的经世致用思想贯穿于他所有的边疆史地研究及其撰述之中。因此，时人程恩泽称其研究是"穷源溯流，荟萃贯穿，能挈其巨，实经世可施用。"⑥而萧腾麟则鉴于"今戍臣商贾络驿不绝，各处途程，理应备载，以便行旅。"⑦遂有以详于赴边路程为特色的《西藏见闻录》。

再是，此阶段的边疆史地研究中反映了一种歌颂和宣扬清代空前统一和疆域辽阔的气概。

此阶段的边疆史地研究者除封疆大吏外，便是谪臣遣士，如祁韵士、徐松都是因事遣戍伊犁，但是在他们的边疆史地研究及其撰述中，丝毫看不出有忧怨之词。祁韵士在其《濛池行稿》自序中深情地写道："忆曩者纂传时，尝念国家版图式廓，西北尤为广袤，为古所未有。戎索所至，部别区分，其山河幕落，传闻异辞，窃慕康熙间图侍读理琛奉使绝域之事，思亦躬履边徼，详志所见，以广见闻，讵知此念一动，早为今日之谶乎？原籍是得以孳孳于诗，补平生所未逮，亦未始非幸矣。"又言："赤备三岁，余奉谪濛池，橐笔自效，缅思新疆二万余里，为高宗纯皇帝神武独辟之区，千古未有，余既得亲履其地，多所周历，得自目睹。"⑧字里行间不仅没有丝毫忧怨凄婉之辞，反而有因祸得福，得偿夙愿之感，因为他毕竟有幸亲眼目睹了国家空前统一和疆域的广袤辽阔，并认为清代这种空前统一和疆域辽阔是"千古未有"的"壮举"和"盛世"。时人评价徐松的《新疆赋》时亦有同感："自来放逐之徒其发为文章，大都反复以辨其诬愤，激以行其志，即或寓忧危之旨，写劳苦之词，亦令观者读不终篇，啾然掩卷，此其皆返于中而不能愧怍求于也，而不能无所怨尤，故不得已而为此。若星伯之兀兀铅椠于殊方绝域之地，宣皇风而扬盛轨以成其独有千古者，志趣固已过人矣。"⑨笔者以为这正是"乾嘉盛世"余波在边疆史地研究中的反映和延伸。

最后提及的是，此时的边疆史地研究还呈现出文献考辨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特征，强调"目验得之"的重要性。可以说此阶段的边疆史地研究及其撰述悉为研究者"亲履其地，多所周历，得自目睹"⑩的产物。史载徐松赴西域"自出关以来，于南北两路，壮游殆遍，每有所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近仆夫、驿卒、台卒、通事，一一与之讲求。"⑪这种认真严谨、实事求是的学风无疑更增加了其著述的可信度。

第二阶段是边疆史地研究开始发生鲜明变化的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研究成果有：龚自珍的《蒙古图志》、《西域置行省议》、《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北路安插议 》、《御试安边绥远疏》、《最录平定罗刹方略》、《与人论事海事宜书》，沈垚的《元史西北史地蠡测》、《地道记》、《新疆私议》、《西域小记》、《六镇释》、《西游记金山以东释》，李兆洛的《大清一统舆地全图》、《地理韵编》，俞正燮的《喀尔喀伊犁》、《蒙古》、《澳门纪略跋》，程恩泽的《战国策地名考》，张穆的《昆仑异同考》、《魏延昌地形志》等私家著述。官修则有：《钦定回疆则例》、《钦定平定回疆剿逆裔方略》等。这一阶段由于清皇朝已从强盛的巅峰上跌落下来，开始走向全面衰落，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均已凸显出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12]，“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不十年惧或烦兵事。”[13]便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这无疑给觊觎中国西北边疆多时的沙俄和英国以可乘之机。嘉庆二十五年（1820）流亡在国外的原维吾尔上层统治者后裔张格尔在英国的怂恿和支持下，勾结浩罕国势力，利用新疆各族人民对清朝官僚统治腐败的强烈不满和仇视，窜入南疆，煽动分裂祖国的叛乱，直至道光七年（1827）叛乱才最后平定。此外，沙俄自十九世纪 30 年代起，就对中国西北境内的巴尔喀什湖和斋桑湖地区进行武装侵扰和非法占领，自此，中国西北边疆进入“多事之秋”。由于历史条件的新变化，致使边疆史地研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于是这阶段的边疆史地研究亦发生了有别于以往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

首先，是将边疆史地研究同安边固防结合起来，从而使这种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感。这又涵盖了如下两层含义 ：

第一，是加强对新疆的行政管理，提出了在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针对西北边陲的动荡局势，龚自珍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撰写了《西域置行省议》，并于其中首次提出了在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对新疆的边防、经济、以及 14 个州、40 个县悉作详细论述。因为自乾隆以来，清皇朝对新疆的管理一直沿用派遣将军和参赞大臣等“镇守”的办法，缺乏一整套系统完备的行政管理机构，这显然不适应日益复杂严峻的新疆局势，尤其是不利于开发新疆和安边固防。因此，龚自珍主张在新疆设置同内地一样的行省，这既有利于中央加强对新疆的管理，又有利于开发新疆，维护国家的统一。同时提出迁“内地无产之民”入疆垦荒，如此非但可以缓解日益严重的流民问题，稳定社会，而且又能将开发边疆与巩固国防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后，龚自珍意味深长地写道：于新疆建省虽然“现在所费极厚，所建极繁，所更张极大”，但是“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后，利且万倍。夫二十年，非朝廷必不肯待之事，又非四海臣民望治者不及待之事。然则一损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国运盛益盛，国基固益固，民生风俗厚益厚，官事办益办，必由是也，无其次也。其非顺天心，究祖烈，剂大造之力，以统利夫东西南北四海之民。”[14]强调要从国家的统一独立和长治久安之根本利益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在新疆置省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与价值。从龚自珍首倡新疆建省之说，至 1884 年新疆正式建省，这期间经历了六十四年的风风雨雨，足见其远见卓识。

第二，强调安边固防要同处理好民族关系紧密地结合起来。

沈垚认为要保持边疆的长期和平与安定，进而维护国家的统一，除了加强边备，屯田积谷外，还必须慎重对待和妥善处理好民族关系。因为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所以搞好民族团结与和睦是边疆安定的重要保障。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他指出造成新疆动荡迭起、干戈屡动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政府驻新疆官吏缺少安边柔远之心，不仅不能尊重维吾尔民族的民风习俗和宗教信仰，甚至“乃恣为贪酷，侵夺财货，虏辱其妇女，以积其愁苦冤怨之气，然犹未遽叛也，一有桀黠凶悍之人乘机鼓扇，而后向之穷志无聊者，皆揭竿起矣。”[15]因此，沈垚希望驻新疆官吏能从其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同时他又指出：“故欲使西陲无事，必自镇守诸臣能仰体皇上安边柔远之心始。”[16]意在提醒驻新疆官吏要使新疆平安无事，必须从边疆的安危与否直接关乎国家的安危之高度，来处理好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龚自珍亦从反思历史的视角，指出搞好民族关系对安边固防的重要性，他说：“吾师亦知乌什往事乎？素诚者，旗下役也，叨窃重寄，为领队大臣。占回之妇女无算，笞杀其男

亦无算，夺男女之金银衣服亦无算，乌什杀素诚以叛。乌什之叛，高宗且挞伐，且哀怜。圣谕以用素诚自引咎，御制诗时以激变为言，谓素诚死有余罪。纳世通、卡塔海之诛也，非以失机也，以平日扰回也”。通过对惨痛的历史教训的认真回顾与总结，龚自珍恳请领队大臣宝公能以史为鉴，“今回人安益安，信亦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驼羊视回男，不以禽雀视回女。回人皆内地人也，皆世仆也。”[17]龚自珍认为对维吾尔族只要能一视同仁，以诚相待，就一定能搞好民族关系，只要搞好民族关系，就能保证边疆的长期安定。对此，他说：“故吐鲁番安，而四大城皆安；四大城安，而天山南路举安；天山南路安，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天山北路安，而安西南路北路举安。伊犁将军无内顾之忧，兰州总督无外顾之忧。”[18]最后，龚自珍还主张从事农耕的汉族人民和从事畜牧的少数民族人民要彼此尊重，互不侵扰。即“耕者毋出屯以垦，牧者毋出圈取刈，上毋虐下，下毋藐上，防乱于极微，积福于形。”[19]这种从搞好民族关系的视角入手来探讨安边固防的认识，是这个阶段边疆史地研究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

其次，在这个阶段的边疆史地研究中反映出了鲜明、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主要表现为对国家统一的全力维护，1827年，张格尔叛乱被平定后，新疆如何善后问题一时间则成了朝野上下关注和议论的中心。针对一些人以喀什噶尔四城“悬远难守”，而且费用浩大为由，主张放弃上述四城的议论，龚自珍撰文义正辞严地指出：“臣闻前史安边之略，不过羁縻之，控制之。虽有长驾远驭之君，乘兵力之盛，凿空开边，一旦不能有，则议者纷纷弃地，或退保九边而已耳。非真能疆其土，子其人也。国朝边情边势，与前史异，拓地二万里，而不得以为凿空；台堡相望，而无九边之名。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20]又言：“回人皆内地人也”[21]。在龚自珍看来，当时清皇朝边情边势与历朝往代已大不相同，所以不可以简单地照搬从前所谓“凿空”、“羁縻”等安边之策略。这主要由于过去的“羁縻”之地已尽入中国的版图，并且成为中国领土中“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其人民经过长期的交往、沟通与融合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即“中外一家”和“回人皆内地人也”。因此，他坚决反对放弃喀什噶尔四城，并提出了以减轻内地负担，做到供需自给，变输血为造血为特色的“足食足兵”的安边固防对策。最终目的还是着眼于全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反映了他鲜明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中已含有了近代国土意识和中华民族之整体的民族意识的新因素，这是前所未有的认识。沈垚也撰专文《新疆私议》予以驳斥，他说：“不欲耗内，则必弃外，此议者所以有四城悬远难守之说也，然则远终不可守乎？非也。不尽其守之道，故不可得而守也。不守远必守近，而守近之费不减于远或更甚焉。”[22]又批评道：“谓西域绝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真迂士之论！”[23]同时，他还结合汉以来历代经营开发西域的历史，论证新疆的安定对安边固防、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与统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进而针对当时一些人以喀什噶尔四城“悬远难守”，且费用浩大而主张放弃的议论，沈垚在予以尖锐批驳的同时，又提出了加强边政建设，整治水利，屯田垦荒等安边固防的建议。他阐发道：“镇守诸臣，诚以时度地形，益治沟洫，广田蓄，务储积，则内地之输可罢，蓄积益多，兵食益足，缓急有备。”[24]旨在强调开发新疆同安边固防结合起来，以期达到新疆边政自给自足，减轻内地的负担和中央政府的压力。只有如此，方能更好地安边固防，进而维护国家的统一。像这样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的统一在以往的边疆史地研究及其撰述中还是罕见的。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十九世纪前期的边疆史地研究及其著述仍以考据边疆历史地理沿革为主，研究方向大多集中在西北边陲。虽然其中已反映了一定的忧患意识，但是这只是像龚自珍、沈垚这样个别先觉者的一种敏感，并没有成为所有研究者的一种共识。而这种忧患意识主要着眼于论证搞好民族关系对安边固防、维护国家统一的必要性。

尽管如此，还是应该看到十九世纪前期边疆史地研究中所体现出的实事求是、认真谨严的学风、经世致用的撰述主旨，以及鲜明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等等，这些对推动十九世纪后期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化与创新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它不仅为十九世纪后期

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化与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亦为其提供了颇具启示的思想资料。

二、十九世纪后期边疆史地研究的新趋势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25]之烽烟四起，海警沓至的严峻局势的出现，以及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边疆史地研究抗敌御侮、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忧患意识的增强与深化。

忧患意识是指人们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思考问题，深切关注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前途与命运而产生的一种自警精神和危机感。同前期相比较，十九世纪后期边疆史地研究所表现出的忧患意识是以筹边谋防，抵御外侮之爱国主义精神为内涵和底蕴，而且成为所有研究者一种鲜明、强烈的意识。这又涵盖了如下几个层面：

第一，是对当时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因闭塞孤陋而致的“暗于边情”之状况的强烈的焦虑和忧惧。

因为探讨如何安边固防，有效地抵御外侮，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对策方略，是自鸦片战争以后，每一个忧国虑时而从事边疆史地研究者所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由于无论是“筹边”、“备边”、“谋防”，乃至“靖边”，关键就是必须“知边”——了解“边情”，主要指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知边”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知己”、“知兵”，如此方能“战胜攻守”、“审势察机”，立于不败之地。但当人们进入研究领域后，发现尽管前人在这方面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然而真正意义的边疆史地研究却寥寥无几，就是在这有限的研究之中不仅多有疏漏讹误之处亟待补订，又表现为畸轻畸重，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受到重视，而西南、东北边疆及东南海疆史地则尚未展开。可见这种状况已无法适应和满足抵御外侮、救亡图存之时代和社会的迫切需要。对此，边疆史地研究者们倍感焦灼和紧迫，其忧患之情溢于言表。魏源针对记载边疆史地的官书的疏漏之弊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官书之弊，莫患于两不收。盖分门编纂，互不相应。如雍正中，北路大军始驻科布多，继移察罕瘦尔，乾隆中又移乌里雅苏台，是三地为屡朝筑城，屯兵控制西北重地。《一统志》成于乾隆平定新疆之后，乃于此三地一字不及。盖图伊犁者，既以科布多及唐努山乌梁海图，而于察罕瘦尔亦不之及，遂以两朝亲王大将军重兵之所，竟莫知所在，此其疏一也。《一统志》于外藩疆域末附云：‘盛京东北濒海，有赫哲、费雅喀、库伦、鄂伦春、绰奇楞、库野、恰喀拉诸部落，各沿海岛居住，每岁进貂皮，设姓长乡长子弟以统之，鄂伦春并设佐领供调遣，皆隶于宁古塔、黑龙江将军，地虽极边，人则内属，故不列于外藩云云。夫既不列于外藩，则东三省边城中谅必及矣，乃又一字不及。《皇清通典边防门》亦沿此数语，甚至《盛京通志》于此数部之疆域、四至、户口、沿革亦一字不及。则此各部者，既不获列于外藩，又不获列于内地，动称国初声教逮于使犬、使鹿，而地在何方？人为何等？茫如绝域。此又两不收之一失也。至于索伦、达呼尔、巴尔虎、锡伯、封勒察、毕勒尔等兵，均为东三省驻防劲旅，其人既非满洲，自当详其部落，乃《盛京通志》、《八旗通志》与夫《一统志》、《会典》皆不及之，相沿但呼为‘索伦兵’，无知何种落者。何况天命间削平诸部概归满洲者，更谁问其今为某地乎？以本朝之人谭本朝之掌故，钩稽不易如此，又何论远古？何论荒外？”[26]他藉对官书疏漏之弊的批评，既发出了研究边疆史地的不易和艰难，又对这种疏漏将有碍于全面正确了解“边情”，进而为国家抵御外侮，制定克敌制胜的方略也表示出深深的忧虑。继之，魏源又对民间边疆史地研究者因受“夷夏观”的束缚和影响而导致的边疆史地研究的视野狭窄和由此而生的舛误进行了批评。他不无忧虑地写道：“儒者著书，惟知九州以内，至塞外诸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故赵氏翼谓噶尔丹败于土腊河，马尔赛不于归化城邀其归路，俞氏燮谓西藏即古佛国，即中印度，已皆差歧数千里。”[27]这种研究视野的狭窄和由此而生的舛误，不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国人对“边情”的无知和愚昧，像赵翼、俞正燮这样的名家尚且如此“孤陋寡闻”，那么大多数国人对“边情”的了解就可想而知了，同时又寄寓了魏源欲通过边疆史地研究，以逐渐改变朝野上下“昧于边情”之状况的焦虑之情和良苦用心。

姚莹亦对陈腐落后的“夷夏观”而致国人对“边情”的漠视与无知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愤然写道：“莹谓：中国，周有象胥之官，所以通四方夷狄之言语也。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如晋《乘》、楚《梼杌》之类，大抵不出《禹贡》九州之域。盖三代以来，不勤远略，非复黄帝、神农以前，德被遐荒之旧矣。儒者习于所见，皆以侈谈异域为戒，而周穆王之享西王母，汉武之通西域，无不诟其夸侈，为其病中国也。然而古今异势，非可拘谈，三代王畿，不过千里，其外，自侯、甸以逮要、荒，屏藩以次巩固，自无事于远求。及秦、汉以来天下一统，则昔之所谓要、荒者，今皆吾接壤，直侯、甸耳，岂勤远略哉！谓固我屏藩，不劳师于异域可也，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平居大言，谓一事不知为耻，乃勤于小而忘其大，不亦舛哉！”[28]他认为封闭隔绝、狂妄自大、迂腐落后的“夷夏观”，既是导致国人对“边情”的漠视与暗昧的根源，又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中，“昧于边情”、“御侮乏术”而屡遭重创和惨败，乃至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姚莹在强调了解和研究“边情”，对抗敌御侮、救亡图存之至关重要的同时，又对“暗于边情”的现状与随之而来的恶果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和焦灼，在这忧虑和焦灼之中更融入了他对国家和民族之前途命运的密切关注和牵挂。姚莹的《东槎纪略》就是激于这种忧患而作。

他如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曹廷杰的《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东偏纪要》、《东三省舆地图说》，姚文栋的《滇缅勘界记》，邓承修的《中越定界图》，薛福成的《中缅交界图》，吴大澂的《皇华纪程》、《吉林勘界记》，丁谦的《蓬莱轩舆地丛书》，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都是激于筹边谋防、抵御外侮之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内涵和底蕴的深沉的忧患意识而作。

第二，是对“边患”认识不足的忧患和焦灼。

鸦片战争的惨败，并未使绝大多数的朝野人士清醒过来，他们始终认为：外夷外强中干，难以自生，“是彼当仰命于我，我不应有虞于彼。”[29]以至在鸦片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列强仍有所图谋的情况下，朝野上下竟然在“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30]即谓在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侵扰和蚕食所造成的严重的“边患”，乃至随之给国家和民族将带来更为严重的劫难缺乏清醒足够的认识。鉴于此，边疆史地研究者们为唤醒国人的忧患意识，激发国人的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以调动和集中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去抵御外侮，救亡图存，遂将他们对“边患”之自觉清醒的认识倾注于其撰述之中。

鸦片战争后，清国势日衰，沙俄乘机加紧侵华，蚕食中国疆士，但并未引起绝大多数国人的警醒。何秋涛正是出于人们对“俄患”缺乏清楚足够认识的忧虑而作《朔方备乘》，他“益究经世之务，尝谓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乃采官私载籍，为《北徼汇编》六卷。”[31]后又增补图说至80卷。咸丰八年（1858）将是书进呈于咸丰帝，颇得其赞誉，遂赐名《朔方备乘》。何秋涛于该书中，以“边防之事有备无患”和“其所以防患于未然者，意至深远”[32]之自觉清醒的忧患意识为指导思想，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来说明对中国北部边疆构成侵略威胁最大的就是沙俄，以引起国人对“俄患”的警醒与关注。他通过对沙俄自清初以来，就屡屡侵犯中国北部边疆的史实之认真研究，指出“俄患”由来已久，旨在使国人能识破沙俄长期以来觊觎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阴谋。他说：“略地而东，遂于顺治年间窃取雅克萨地，侵扰索伦等部垂四十年。”[33]沙俄甚至还图谋侵入新疆地区，乾隆年间，就曾暗中支持新疆地区额鲁特辉部阿睦尔撒纳分裂祖国的叛乱，阿睦尔撒纳兵败遁入沙俄境内，沙俄仍“欲抚而用之”，后因其很快病死而未能得逞。[34]这些无疑有助于国人认清沙俄的侵略本性，增强边疆危机意识。在此基础上，他从对与中国北部边疆接壤之诸国国力的比较分析中，亦认为沙俄是中国北部边疆之最大的强敌和威胁。他意味深长地写道：“因为中俄边境广袤万里，同中国北疆为邻的，除“哈萨克之外，惟俄罗斯为强国。然则边防所重，盖为以知矣夫。”[35]由此他大声

疾呼道："西北塞防，乃国家根本。"[36]可见其言语之中既凝结着何秋涛由于对"俄患"认识的深刻透辟而生的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与牵挂，又渴望通过他的研究与撰述加深国人对"俄患"之严重性的认识，并反复告诫国人对沙俄万万不可放松警惕，掉以轻心。同时，他更期待国人能将防备"俄患"的北疆边防提高到直接关乎国家休戚安危之战略高度来认识和对待，以居安思危，早做提防和筹划，有效地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历史证明：何秋涛于《朔方备乘》中对"俄患"的认识和判断是正确的，具有预见性的；就在何秋涛辞世两年后，沙俄就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南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去。

作为何秋涛的后继者曹廷杰，致力于东北边疆史地研究前后达三十余年之久，他的《东北边防辑要》等书亦是出于对"俄患"日趋严重之忧患和紧迫而作。故他尽管盛赞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于中俄交界及俄国古今疆域无不条分缕析，诚如圣谕所谓制度沿革，山川形势，考据详明也。顾其时东南多事，俄人乘隙窥我东北，尚有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城定议界碑，足严中俄之限。故其书于东北边界时由安巴格尔必齐河源外兴安岭东抵海，凡中俄分属山河不惮详述。"[37]即谓该书对备边抗俄虽多有裨补，但因《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今则疆界以殊，情形不同矣"[38]，也就是说《朔方备乘》的内容已不能完全适应当时边疆防务的需要。故曹廷杰试图在《朔方备乘》的基础上，结合新形势，对东北边疆与防务重新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以适应备边抗俄的需要。曹廷杰于该书中通过追述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的历史，着重分析了沙俄惯用的侵略伎俩和特点。他说："再考俄人开疆，每多取人之所不取，或人之所不及防。即如咸丰时，窥我东南有事，乘机窃发，两次进踞，正亦顺治初乘我入关之师初定中原，因而窃据故智耳。弛守备则蓦入，张声威则潜退，穿踰之盗何以异此！此则夷情之今犹古若者也。"[39]他指出沙俄惯用的侵略伎俩就是乘人之危和趁火打劫，目的是使国人从惨痛屈辱、代价昂贵的历史教训中汲取有益的启示，引以为戒，树立和增强防备"俄患"之清醒自觉的国防意识，以期从根本上改变以前由于对"俄患"之严重危害缺乏清醒足够的认识而致的"无兵以为之备、无民以为之防"之边备弛废的状况，充实和巩固边防，严阵以待，不给惯于使用"乘人之危"和"趁火打劫"之侵略伎俩的沙俄以一丝一毫的可乘之机，使东北地区成为抵御沙俄侵略和保卫国家安全的坚不可摧的屏障和堡垒[40]。

必须指出的是，边疆史地研究者们的忧患意识，绝非一时的热血沸腾和慷慨陈词，而是以对国家和民族之深沉的挚爱和高度的关注为底蕴与内涵，以筹边谋防、抵御外侮、救亡图存为宗旨，是历史认识与现实判断的思想结晶。因此，边疆史地研究者们既大声疾呼了解与认识"边情"和"边患"的重要，以引起国人的警觉与关注，更注重研究和探讨如何筹边谋防、抵御外侮、消除"边患"，以保卫国家安全的方略与对策。这是边疆史地研究与撰述的共同特点。

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以方域为骨骼，以事实为血肉，记述了自古代迄于道光年间内外蒙古之地理沿革与重大史事。作者于自序中语重心长地写道："今之所述，因其部落而分纪之。首叙封爵、功勋，尊宠命也；继陈山川、城堡，志形胜也；终言会盟、贡道，贵朝宗也。详于四至、八道以及前代建置，所以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也。"而"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是该书的主要着眼点。故该书既论述了蒙古各部同历代统一皇朝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它与清皇朝的密切关系，对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全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为清皇朝的治乱兴衰的历史表明：蒙古是清皇朝主要的政治、军事支柱之一，它所拥有的精兵强将和所处的地理位置悉与清北疆的休戚安危息息相关。如每"有大征伐，（科尔沁部）必以兵从，如亲征噶尔丹，乃剿策妄阿喇布坦、罗卜藏丹津、噶尔丹策凌、达瓦齐诸役，札萨克等效力戎行，莫不懋者勤劳。"[41]故张穆十分赞同清皇朝支持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加强和密切内地同蒙古联系的举措，认为它有利于边防的巩固与安全。反映了作者以思考历史为起点，以服务现实为归宿的鲜明、自觉的经世致用意识。又由于外蒙古广袤千里，是中国北疆的门户和屏藩，了解其山川险夷、要塞关津，直接关乎到边防的巩

固和国家的安危。因此张穆强调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考察山川城堡，其目的就在于“志形胜也”。故他旁征博引，由今溯古，详审地考察了蒙古各处地形、驻军重镇与边地卡伦、屯兵地点等，旨在为国家筹边谋防、抵御外侮提供借鉴和依据。如其所记：“喀尔喀、杜尔伯特、土尔扈特诸部，或跨大漠杭海（即杭爱）诸山，或据金山（今阿尔泰山）南北，或外接俄罗斯、哈萨克诸国，所居皆天下精兵处，与我西北科布多、塔尔巴哈台诸镇重兵相为首尾。”[42]这对了解“边情”，殊多补益。同时张穆在该书中还多次提到防俄问题，他在论及中俄边界地恰克图时指出：“恰克图边东车臣汗部十四卡伦，沙甸平坦。边西多山，林木蓊郁，往来以色楞格要津，连冈而东。边南至衮图达坎罕，其间峡沟丛树，险隘天成，足资防御。”[43]明确地表达了其巩固边防，以备“俄患”的思想。

曹廷杰的边疆史地研究表现了更为强烈的自觉的筹边谋防和防备“俄患”的意识，史载他利用“公余暇日”，或者“躬亲考验”，进行实地调查；或者“手不释卷”，“荟萃群书”；“凡东三省地理险要与夫古人用兵成迹有关于今日防务者”，无不详加考究。论及吉林防务时，曹廷杰结合时局与疆界的新变化谈道：“咸丰十一年与俄罗斯分界由乌苏里江口逆流入兴凯湖，逾岭抵图们江口，江以东皆为俄属，于是宁、珲、姓三城边防始重。查珲春南四十里黑顶子，又东南岩杵河、摩阔崴，又东北阿济密、蒙古街、虾蟆塘、海参崴等处地方，宁古塔东南六百余里双城子，又东北二百里红土岩地方，三姓东北八百余里徐尔固，一千六百余里伯利地方，俱俄人与吉林交界要隘，而徐尔固、伯力、双城子、虾蟆塘、海参崴、蒙古街、阿济密、岩杵河诸处，均有重兵戍守，则吉林边防可因敌而筹制胜之方矣。夫宁、珲要害诚在宁、珲，三姓要害则在黑河口、蜂蜜山二处。盖黑河口在东北七百余里，当水路之冲，凡顺黑龙江而下，逆混同江而上者，此处实扼其咽喉；蜂密山在三姓东南六百里，与宁、珲成犄角之势，与三姓为陆路之门，南可断岩杵河、海参崴诸处之后路，北可据伯力之上游也。若夫鸭绿、图们二江发源之处，虽关于沈阳者甚巨，而系于吉林亦非轻。至乌苏里江口以上，诺罗、奇讷林二河之间部落，仍属赫真疆域，实非瓯脱矣。”[44]这是曹廷杰依据时局和疆界的巨变，以及抵御沙俄、巩固边防之新形势的迫切需要所描绘出的一幅全新的防务图。他既提出了新的防务思想和对策，又逐一指出在新的防务体系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新的关隘要塞所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利害攸关的联系，颇具启示和补益。

姚莹的《康辅纪行》亦是出于了解“边情”，有裨边务而作。故该书既提出了一些有助于了解“边情”，加强边务之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和方略，又有针对性地绘制了《西藏外各国地形图》、《乍雅地形图》等。他在解释绘图动机时说：“先是哲孟雄与披楞隔界有大山，甚险阻，无路，有一线道可容羊行。近为英人所据。屯兵其上，凿宽山道，可以长驱抵藏矣……阿里西边外为拉达克，本有阿里半境，而为达赖喇嘛所有。道光二十年，尝诱森巴入寇。森巴在拉达克之西北，其南为白木戎，又南即通中印度之痕都斯坦，近亦为英吉利所据矣。痕都斯坦之北为克什弥尔，即北印度也。又北则葱岭前后诸国。痕都斯坦之西为包社大白头回国，又西北则俄罗斯所据南都鲁机地。近年英、俄二夷，在西北二印度之间构兵，盖俄罗斯之垂涎前、后藏也。今为此图，俾吾中国略知其形势云。中国西边与英吉利所有东、中二印度也，皆以黑线界之。”[45]姚莹既欲藉此图使国人知晓西南边疆所面临着为英、俄两个列强蚕食和吞并的严重危机，以增强国人的忧患意识，尽早预防和准备，又想通过此图为制定加强西南边务，有效地抵御外来入侵之对策方略提供直观真切的科学依据。

可见，尽管边疆史地研究者们的忧患意识与古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有许多共同点：诸如对国势的盛衰、世风的臧否、民生的忧乐等，悉寄寓深切的关注之情。但随着历史的巨变，现实的需求，而注入了新的内涵，使忧患意识因时代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古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所关注的是王朝的治乱兴衰，而边疆史地研究者们所着眼的是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前者是王朝意识占主导地位，后者是民族、国家意识占主导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忧患意识的不同，既使十九世纪边疆史地研究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而与古代的历史地理学分道扬镳，又使十九世纪边疆史地研究成为由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其次，表现为边疆史地研究与外国史地研究的结合，即谓十九世纪后期边疆史地的研究者们将筹边谋防、抵御外侮同了解和认识“夷情”——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把边务乃至国家和民族的休戚安危置于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之错综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中去思考、判断乃至抉择。也就是说开始用世界的眼光来审视和筹划边疆防务和国家安全问题，表现了恢廓的视野。这在中国历史撰述上是空前的。这亦涵盖了如下两个层面：

第一，将筹边谋防、抵御外侮同了解“夷情”——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鸦片战争的空前惨败和处理“边事”的屡屡失利受挫，使边疆史地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之所以会落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强邻四逼之痛苦屈辱、祸患接踵的危机境地，就在于对“敌情”——“夷情”的一无所知和不屑一顾，结果只能在毫无准备和防范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有备而来之敌，最终惟有被动挨打。还有这个敌手已非从前披发左衽、以骑射见长的周边少数民族，而是拥有坚船利炮、武装到牙齿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都使边疆史地研究者们深切地感到要想加强边务，有效地抵御外侮，仅是“知己”是远远不够的，更应该“知彼”，即必须了解和认识“夷情”——外部世界，真正做到“知己知彼”，这是将“夷情”视为“边情”中的重要部分。这个认识是在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而昂贵的代价后获得的。对此，边疆史地研究者感触尤深。

姚莹在这方面是为数不多的“先行者”之一。早在十九世纪初开始，姚莹即开始留心“夷情”，以备“边情”之需。他不无感慨地写道：“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著论于《识小录》矣。然仅详西北陆路，其西南海外，有未详也。及乎备兵台湾，有事英夷，钦奉上询英地情事，当时据夷酋颠林所言，绘图陈说，而俄罗斯距英地远近，莫能明焉，深以为恨，乃更勤求访问。适友人魏默深贻以所著《海国图志》，大快我心。故乍雅之役，欣然奉使，就藏人访西事，既得闻所未闻，且于英人近我西藏之地，与夫五印度、俄罗斯之详，益有征焉。”[46]既记述了他几十年执著求索的历程，又反映了他将了解和认识“夷情”——外部世界同抵御外侮、筹边谋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清醒、自觉的意识，这是前人所没有达到的认识高度。如其书中所撰《英俄二夷交兵》、《俄罗斯方域（二条)》、《英吉利》、《佛兰西》、《英吉利幅员不过中国一省》等诸多篇目，以及《艾儒略〈万国全图〉说》等外国地图解说诸篇目，悉是了解和认识“夷情”，以为筹边谋防、抵御外侮服务之自觉意识的反映和实践。出于“国家或有事边海时，亦有需于此”的考虑，他在如何了解“夷情”问题上，认为当从学习外国文字入手。他动情地说：“观英吉利、普鲁社、耶马尼之留心中国文字，日本、安南、缅甸、暹罗之讲求记载，是彼外夷者，方孜孜勤求世务，而中华反茫然自安，无怪为彼所讪笑、轻玩、致启戎心也。然如西洋罗所印，说英吉利留心中国史记、言语，亦不过十二人，礼拜庙中尚无座位，岂叶公好龙，中外有同慨耶！余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今老矣，愿有志君子，为中国一雪此言也。”[47]除此之外他认为还应“习其山川，则知形势之险易；习其人物风土，则知措置之所宜，非如文人词客，徒资博雅助新奇也。故留心世务者，皆于此矻矻焉。”[48]他希望人们能更多地关注并身体力行地从事域外状况的考察和研究，因为在“烽烟四起”、“海警沓至”的年代，这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则表现了鲜明自觉的“知夷制夷”之意识。诚如他于该书《凡例》中所言：“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置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所谓“集夷务以烛情伪”，其目的就是为了防备“俄患”，“以昭边禁”，“以固封圉”，即加强边防，有效地防备和抵御沙俄的侵略。所以何秋涛于该书中，既记述了历代于北部边疆用兵得失成败之故，以资借鉴，又详审地考察了从东北到西北的疆域沿革，以及攻防战守之形胜。同时他又系统地考察与介绍了相对完整的俄国的历史、地理、政区、户口、文化、宗教、民族、习俗和物产等概况，以及清前期中俄关系等。如书中所撰写的《波罗的等路疆域考》、《锡伯利等路疆域考》、《俄罗斯亚美里加属地考》、《俄罗斯境内分布表》、《俄罗斯馆

考》、《俄罗斯学考》、《俄罗斯互市始末》、《俄罗斯进呈书籍记》等诸多篇目即是。

曹廷杰不仅疾呼了解“俄情”对加强东北边务，防备和抵御沙俄侵略的重要性，如其所言“俄情常通，似于边防尚有裨益”[49]、“审今日之俄情，切将来之杞忧，”[50]又肩负特殊使命，亲赴实地考察。他说：“窃卑职于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在靖边后路营中，由后路统领葛胜林奉到三月二十二日密札一件，内开：饬职变装一带，密探俄界情形，即游行其境，凡彼兵卒之强弱众寡与夫道路之险易，某某为彼之咽喉要害，均著在留意，默识于心。往返无须拘定时日，总宜探察明白始可报等因。当即遵照指授机宜，订期四月十三日启程前往，呈报在案，嗣于四月二十七日入俄界，即顺松花江至东海口，复由海口溯流入黑河，至海兰泡地方，仍顺黑河返伯利，溯乌苏里江过兴凯湖，经红土崖由旱道至海参崴，坐海舟入岩楚河海口，于九月初八日入珲春界，九月十三日抵省，共在俄界一百二十九日。谨遵密札，探得一百一十八条。凡东海滨省所占吉江二省地界，兵数多寡，地理险要，道路出入，屯站人民总数，土产赋税大概，各国在彼贸易，各种土人数目、风俗及古人用兵成迹，有关于今日边防与夫今日吉江二省边防可以酌量变通，或证据征事堪补史书之阙者，皆汇入其中，终以有事规复一策。不揣冒昧，谨缮具清册一本，并绘图八份，恭呈宪鉴。”[51]这就是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撰述的动机和主要内容。如果说《东北边防辑要》是着眼于历史文献的搜集，那么《西伯利东偏纪要》则偏重于对现实的考察分析。可见他之所以冒着生命的危险，深入俄境内考察，即为了掌握沙俄的侵略动向和信息，研究如何筹边谋防，以备“俄患”，为未来的反侵略做好准备。这既反映了曹廷杰恢廓的视野，又表达了他坚决反对侵略积极抗俄之赤诚浓郁的爱国情怀。因此该书颇受好评，吉林将军希元阅读该书后即致批示说：“据阅图说及笔记各条，于俄界情形详明赅备，迥与寻常游历不同，具有深心，殊堪嘉尚。仰候核定，随折呈览，缴图记存。”[52]后来这位封疆大吏从《西伯利东偏纪要》中摘出八十五条咨送军机处备查，又摘其最要者送呈御览。足见该书在加强边务、抵御沙俄方面的重要价值。

第二，是将边务乃至国家和民族的休戚安危置于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错综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中去思考、判断乃至抉择。也就是用世界的眼光来审视和筹划边疆防务与国家安全问题。

这既体现在边疆史地研究者们从中俄、中英关系的视角来思考和探求“筹边谋防”、抵御外侮之策，又表现为他们还欲通过对国际关系的洞察与分析，巧妙地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魏源曾说：“筹夷情必先知夷情，知夷情必先知夷形”，[53]他认为要筹边谋防，有效地抵御外侮，保卫国家的安全，既需要“知彼”——“悉夷情”——了解自己的敌手，又需要了解自己的敌手的敌手，亦即密切追踪和注视扑朔迷离的国际关系不断变化的新动向，并加以认真研究和分析，就能从彼此的得失利害之相互冲突和对抗中，发现可为我所用的有利形势。只要因势利导，把握为我“可乘之机”，巧妙地利用敌手与敌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如迫于形势的需要，为争取更多的外部支持，甚至可不计“前嫌宿怨”，化敌为友，以集中最大力量应对当前对我威胁最大、最紧迫的敌手，如此可使我在筹边谋防、抵御外侮的斗争中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乃至最终化解危机，赢得反侵略斗争的胜利。这种欲从“世界大势”亦国际关系的变化中来探求边疆防务与国家安全之方略的自觉意识，既反映了魏源具有世界眼光之恢廓的视野，又表现了他对国家和民族休戚安危乃至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和理智判断。这既是中国历史撰述上的重大变化，又是从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明显标志之一。

姚莹亦表述了同样的认识，他说：“嗟乎，海外诸国，其地之幅员何若，其人之生齿何若，吾不知也，海外夷人讲求世务者，乃能知之，而且言之；并吾中国之土地人民亦能知之，言之，确与否吾亦未知也，然大略可睹矣。夫以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甲乎四海如此，海外诸国，无不震惊而尊之如此。彼区区英吉利者，地不及吾二十之一，人民不及吾百之一，且其本国有佛兰西，其新开西海之地有弥利坚，新开印度之地，又有俄罗斯，皆强邻逼近与为仇雠者。故之患在肘腋，实有旦夕之虞，苟能知其虚实与其要领，何难筹制驭乎方略乎！曷不尽取外夷诸书与留心时务者，日

讲求之，更进外夷之人素仇英吉利者，日咨访之乎?”[54]姚莹既通过中英两国国土，人民之大小众寡的显而易见的比较，来增强国人筹边谋防、抵御外侮之自立自强的意识和信心，又认为只要认真关注和研究“夷情”与“时事”，尤其是国际关系，就不难发现英国与法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存有尖锐的矛盾，以及潜在的危机，这样即可巧妙利用英国与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并制订出切实有效的抵御英国侵略的对策方略。

可见，十九世纪后期边疆史地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将边疆史地研究同外国史地研究相结合的新趋势，既有助于其研究从边徼到域外更为广阔的空间拓展和延伸，又有助于打破古代史学关注于王朝治乱兴衰的探讨之狭窄封闭的学术格局，加速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

祁寯藻评价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有言：“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洲《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故此书一出“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致用之益，岂非不朽之盛业哉!”[55]这可视为对十九世纪边疆史地研究之价值与意义最贴切的评价的褒奖。

---

①《清史列传》卷72《文苑传·祁韵士传》。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5，《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③李兆洛：《藩部要略序》，《养一斋文集》。
④缪荃孙：《续碑传集》卷78，《文学三·徐松》。
⑤祁韵士：《西陲要略》序。
⑥程恩泽：《户部福建司郎中鹤皋公神道碑铭》，《程侍郎遗集》卷8。
⑦萧腾麟：《西藏见闻录》凡例。
⑧⑩祁韵士：《西陲要略自序》。
⑨彭邦畴：《新疆赋》跋。
⑪《清史列传》卷73，《文苑传四·徐松传》。
⑫龚自珍：《尊隐》，《龚定庵全集类编》卷5。
⑬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一》，《龚定庵全集类编》卷4。
⑭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定庵全集类编》卷7。
⑮⑯㉒㉓㉔沈垚《新疆私议》，《落帆楼文集》卷1。
⑰⑱⑲龚自珍：《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龚定庵全集类编》卷7。
⑳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疏》，《龚定庵全集类编》卷7。
㉕魏源：《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海国图志》卷71。
㉖㉗魏源：《掌故考证》，《圣武记》附录卷12。
㉘㊼姚莹：《外夷留心中国文字》，《康辎纪行》卷12。
㉙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第1册。
㉚轶名：《软尘私议》，《鸦片战争》第5册。
㉛黄彭年：《刑部员外郎何君墓表》，《一镫精舍甲部稿》卷首。
㉜㉟㊱何秋涛：《北徼形势考叙》，《朔方备乘》卷11。
㉝何秋涛：《索伦诸部内属述略》，《朔方备乘》卷2。
㉞何秋涛：《圣训》，《朔方备乘》卷首。
㊲㊳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自序，《曹廷杰集》上册。
㊴㊹曹廷杰：《吉林根本说》，《东北边防辑要》卷上，《曹廷杰集》上册。
㊵㊾曹廷杰：《条陈十六事》，《曹廷杰集》下册。
㊶55张穆：《蒙古游牧记》卷首祁寯藻序。
㊷㊸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3，卷7。
㊺姚莹：《〈西藏外各国地形图〉说》，《康辎纪行》卷16。
㊻姚莹：《康辎纪行》自序。
㊽姚莹：《详考外域风土非资博雅》，《康辎纪行》卷5。
㊿曹廷杰：《查看俄员勘办铁路禀》，《曹廷杰集》下册。
51曹廷杰：《上希元禀文》，《西伯利东偏纪要》，《曹廷杰集》上册。
52希元：《西伯利东偏纪要》阅后批文。
53魏源：《筹海篇三》，《魏源集》下册。
54姚莹：《英吉利幅员不过中国一省》，《康辎纪行》卷12。

（作者徐松巍：黑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邮编150000）